

# 海南职教呼唤企业深度参与

## ——从德国双元制视角看我省职业教育

本报记者 李科洲

### 基层聚焦

“学校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上,缺乏企业的参与,学生虽取得了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书,但并不能完全取得企业的认可。”近日,在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在海口市主办的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研讨会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负责人朱琳揭示的这一现实问题,在与会的省职业院校代表中引起共鸣。为此,记者会后走访了多家职校和相关企业,试图从德国双元制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调研其应对之道。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针对类似缺陷,我省已经在寻找有效的办法,如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企业冠名班等,但职教专家认为,这些与德国的“双元制”比起来,企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双元制是指学生在学校接受基础理论培养和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紧密结合的一种职业教育模式,为德国的制造业培养了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因此,双元制被称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这一模式在我国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以及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推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我省的职业教育能从双元制中获得怎样的启发?能否进行一次深刻的机制体制变革?

### 学校困惑:理论与实践脱节

对于朱琳的说法,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教师桂雯雯也有同感:学校能进行语言能力的培养,但对职业技能的培训却很欠缺。

海南大学教授翁长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教学过程中,企业的参与度严重不够。

据德国汉堡商会国际合作部主任斯维博格介绍,在德国,职校学生入学前就需要在企业中寻找实习岗位,并且通过商会和职校签订培养合同。这样,在学生的全部学习时间里,有三分之二用于在企业的实践,三分之一用于学校专业知识学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强,企业对其认可度也高。

然而,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海南很多企业对于参与培训的兴趣不大。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黄景贵说,学院在联系实习单位、邀请企业技师到校任教等事情上都遇到很大障碍,企业只想用现成的熟练工,不愿支付培训费用。

省高级技工学校机械部主任高宇斌告诉记者,他在德国考察双元制时就发现,德国企业每培养一名职校生,一年就要付出1万到1.5万欧元的成本,因为企业把参与培训视为社会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必要的人力资源投资。但我们的企业还缺乏这种理念。他举例说,省内有几家大企业这几年每年到技工学校录用一两百名毕业生,但从未参与到学校的培训中来,更没有对学生培养投入一分钱。

业内人士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制定相应的激励和强制性法规,促使企业乐意和必须参与到职校学生的培养中。比如,江苏省常州市就建立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作指导委员会,并规定企业要提取一定比例经费用于技能人才培养,

政府对开展校企合作、实习培训的有关人员给予奖励,对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开展产学研结合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予以税前扣除。虽然这些措施和德国的双元制还有差距,但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学生困惑:学习与兴趣脱节

高宇斌感慨:职校学生中存在一股厌学情绪,有部分学生很难管。省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院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我省职校相当部分学生方向感不强,即对未来的职业生涯缺乏规划,职业思想不牢固,存在混日子的心态。

业内人士分析,其原因是一部分学生缺乏职业兴趣,他们所学的专业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遵从父母或老师要求,或是追随社会潮流的结果;二是企业对职校生在新薪待遇上存在歧视行为。

赴德考察过双元制的高宇斌告诉记者,德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开设职业兴趣班。学生一周有一天时间到企业参观或通过游戏等形式了解职业特点、培养职业兴趣。这样,学生到九年级即初中毕业时,即已根据自身的爱好和特长对职业选择初步确定了方向。另外,德国职校学生社会认可度高,待遇上高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也使得职校生的生源质量有了保证。

教育人士认为,德国双元制的这些理念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引进。

### 企业困惑:用人与供给脱节

“企业需要的是动手能力强的人才。”

海南新世通医药集团副总经理蔡柳花告诉记者,公司在海南6年的经营历程中,对这一点感受特别深。

她说,公司从学校招来的毕业生上岗后,还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培养,才能适应岗位要求。有教育人士曾向她建议,与其这样,不如由企业一开始就在职校实行订单式培养,但企业也有苦衷,投入成本培养出的人才,经常被别的企业挖走。其大环境就在于大部分企业不愿投入培训成本,只想用现成熟练工,对投入培训的企业造成了挤压效应。

据了解,海南制药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职业人才的需要显得特别紧迫。为解决这一问题,新世通集团自己开办了一家中等职业学校,主要培养药业人才。但由于场地有限,招生规模一直无法扩大,办学较为艰难。

采访中,有关人士一致的看法是,要让企业深度参与到职校学生的培训中,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在德国,双元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学校和企业,还涉及政府、行业协会等。这其中,行业协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负责组织招生、组织考试、监督企业以及教育效果评估、证书颁发等,已经拥有了部分政府职能,有很大的权威性。而我们的行业协会没有这样强大的职能,根据实际需求,应该由政府出面,对企业和职业学校的办学体制进行改革,有效地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开展校企一体化教学实践。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 西沙永兴岛:海南最后的邮电局



十一月六日,邮电局工作人员给出岛的邮件盖邮戳。

本报西沙11月7日电(记者李英挺) 11月6日,记者来到设在永兴岛北京路的邮电局营业厅,营业厅门前分别挂着中国电信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邮电局牌匾,这就是我国最南端的邮电局,也是海南唯一的一所邮电局,即邮政和电信没有分离,被称为“海南最后的邮电局”。

20多平方米的邮电局大厅里,2位工作人员正埋头紧张地给出岛的邮件盖邮戳、分拣从岛外寄来的邮件和包裹。大家都认为西沙永兴岛上邮电局盖的邮戳非常有意义,所以有机会的人都来营业厅买一张明信片或者把预先写好的信件,从邮筒寄出,寄给远方的朋友。

永兴岛邮电局担负着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军民的邮政电信业务。目前,传统邮寄邮件、包裹仍主要依靠供给船往返来输送。“供给船半个月或一个月才来一次,遇到台风季节还会一再延迟,所以一封信的往来需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古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但是随着电话、短信、网络等现代通信方式的多样化,人们的交流方式有了很大改变,传统的书信交流方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邮电局,仍然可以深深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家书依然抵万金。

## “车管所到了咱村头”

见习记者 符玉润 本报记者 文刚

### 基层新事

今天上午10点,一辆车身上印着“海口车管所车管流动服务站”的中巴车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交警中队门口停下,几名协警有的抱着电脑,有的捧着纸箱下车来。

在门口,停着6辆未上牌的摩托车,十几个已经候在门口的村民随着协警们走进了办公大厅。

一放下东西,协警邱坤和柳青马上给围在台前的村民发放摩托车牌证。在发证的空档,他们还忙着给前来办证的人发放表格,并解答他们的疑问。

填表、验车、录入信息、选号、缴费、上牌、牌照拍照,如果带的证件齐全,只要15分钟左右,村民就可以开着办好牌的摩托车离开了。

吴多利是永兴镇美秋村的村民,他上星期一已经上好牌,今天过来取证。“来这里上牌很方便,我从家里骑摩托车十几分钟就到啦。”他笑着说。“上牌很快,十几分钟就弄好。”

这个“车管流动服务站”,是海口市公安

## 他是法官,却极少判案,坚持上门调解化解矛盾,被黎族苗族同胞视为“兄弟”

# 23年不休假的山区法官

本报记者 胡续发 通讯员 刘佳

### 基层人物

山区很静。新修的盘山公路从山头蜿蜒至山脚,又从这座山钻进另一座山。一辆黑色吉普车疾驰在盘山路上,跑出“S”型。这里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地处五指山余脉,海拔约800米。

3日上午,是长征法庭庭长王伟奇下乡调解案件的时间。上午9点从法庭出发,他们来回转了一圈,才找到一宗物权纠纷案的当事人。磨了半天嘴皮子,最终对方答应考虑考虑。此时已是11时50分。

“庭长,你找他谈了5次,这回总算松了口气。”高良开心地说。

“山区群众生活不容易,我们尽量调解吧。”说了一上午话的王伟奇,口干舌燥,在路边小饭店要了一壶茶,猛灌了几口。

他是一名基层老法官。1988年参加工

作,来到长征法庭。这一干,就是23年。按规定,基层法庭应该配备3名法官,可是山区中的长征法庭配置不足,长期以来只有王伟奇一名法官。

“判案容易调解难。”这是法院系统公认的话。但王伟奇从来都坚持上门调解。10年来,他独自一人审理民事案件705宗,其中调解高达592宗。“我们法庭的结案率、调解率,在全县甚至全省基层法院中,多年来都名列前茅。”高良反向记者,“你能想像出来他走了多少山路吗?”

“现在是中午,村民都在家。走,去宣传小额贷款,退耕还林,家庭暴力法律。”吃完饭,王伟奇又出发了。下午1点50分,到了长征镇烟园村,一个苗族同胞聚居村。

86岁的邓玉春从巷子里出来,认出了王伟奇,高兴地笑起来。“阿姑(阿婆),你好啊。”王伟奇热情地拉着老人的手,用苗话问好。

40岁的盘明全坐在自家屋前的石板上,捧着大碗吃饭。王伟奇道别老人,快步走向盘明全,一边伸出右手。盘明全赶紧起身,往裤子上擦了擦沾油的手,迎了上去。“你脑血检怎么样了?好点没有?”王伟奇显然很熟悉他的情况。

“我们村几乎个个都懂(认识)他。”村支书盘明燕掰着手指数,2002年6月,因为买了假种子,全村100多亩水稻颗粒无收,王伟奇判无良商贩赔偿。当晚,他亲自提着5万多元赔偿款,跋山涉水来给村民分钱;前年6月,村里有一宗土地纠纷,王伟奇多次上门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今年3月,年轻人打架造成人身损害,还是他来给成功调解……

“他会说好几种黎话,还学讲我们苗话。在我们看来,王庭长就是我们的兄弟。”盘明燕看着记者的眼睛,话里透着真诚。

下午3时,宣讲结束。恰在此时,王伟奇的电话响了:有人来法庭起诉,赶紧回来立案……

长征法庭管辖4个乡镇,1个国营农场,辖区面积911平方公里,6万多人口。“165个自然村我都跑遍了,有些山我闭着眼睛都能上。”王伟奇乐呵呵地说,最远的村离法庭60多公里,有些偏远村庄得步行10多公里,晚上回不来,只好住在黎村苗寨。

采访王伟奇前,琼中法院副院长林万强告诉记者,王伟奇的脚步走遍了全岛,他有多次调去县城的机会,都被他婉拒了。对此,王伟奇的说法很简单:“我喜欢这里的人,很熟了,有感情,舍不得走。”乡亲们都知道,王伟奇是个不愿休息的人。中午、晚上村民休息时,他抓紧时间走村串户,调解案件;中秋、国庆节,他还是奔波在山区,调解,再调解。甚至春节,他没有回五指山老家看过一次。“23年了,他没有休过一次假!”林万强感动地说。

以法庭为家的王伟奇难免引来亲友埋怨。三弟的话很干脆:你永远没时间回家,这么累干吗,不如回家割胶轻松。

“不是我不想休,而是我领了政府的工资,就要干好工。”王伟奇总是这样回答。(本报营根11月7日电)

## 尖峰岭登山节带来众多游客 农家乐乐了下岗森工

本报记者 王红卫 特约记者 孙体雄

### 基层见闻

日前,记者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海拔1412米的尖峰岭主峰脚下,一个名叫“岭南农家饭庄”的农家乐,遇到了尖峰岭林业局下岗职工王广清夫妇,了解了他们夫妻下岗18年来艰辛创业的酸甜苦辣。

王广清籍籍河南,今年46岁,是一个标准的“林二代”,其父1955年入伍,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义务兵之一,1960年进入尖峰岭林场工作。1965年,王广清在林场出生,1984年进入林场工作,1993年,在林场改制中,作为首批分流职工下岗。

妻子路平也是一个“林二代”,与王广清同龄,也都在同一年下岗。据悉,整个尖峰岭林区,累计下岗分流职工达数千人之多。

夫妻俩同时下岗,家里的收入来源一下子断了。王广清夫妇上有双方的父母,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辛苦。期间,还领过两年的低保。

“下岗后,为了生活,我和妻子到处打工,给人割胶、铺路,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都吃过。但家里的光景始终没有多大起色。”说到这里王广清语气低沉了些。

2000年,王广清和林业局签订协议,承包了尖峰岭主峰脚下60亩荒地,种上槟榔、龙眼等果树,还在林中搭起了茅草屋,

搞起了山中农家乐。此处距离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大门口大约15公里,海拔高度已经达到960米,周围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青山幽谷,十分的幽静。

据王广清介绍,2004年,“岭南农家饭庄”农家乐开始对外营业,但2010年之前,生意也不怎么好。然而,自从去年举办“首届中国海南乐东尖峰岭登山比赛”以来,登山的客人越来越多,农家乐的生意一下子好起来了,今年7、8月份,几乎每天都有登山的客人来这里用餐,尤其是周末,10多张桌子,几乎都可坐满。

为了让自己的农家乐办出点特色来,

王广清在林地一块约3.5亩的水塘上面,建起了两个水上餐厅,客人既可以在上面钓鱼,也可以用餐,休闲用餐两不误。

最有趣的是,由于山中不通电,王广清就花800元钱,利用山中的一条小溪,截流安装了一个1000瓦的袖珍型水力发电机,可以供整个农家乐日常照明使用。

但自从去年生意好起来以后,由于碗筷等消毒用电功率大,小水电机不能满足需要,王广清又花4000多元钱,购买了一台柴油机和发电机,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兼顾林地灌溉使用。

记者了解到,随着连续两届尖峰岭登山节的举办,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已经开始从先前单一的雨林游,向山、林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目前,通往山脚下的通电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随着尖峰岭景区的大发展,我们下岗森工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话语间,王广清流露出了自信的喜悦。

(本报尖峰岭11月7日电)

# 热烈祝贺海南鸿运大酒店

## 荣膺四星级旅游饭店

**祝贺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海南省农垦总局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海南省总工会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海南省农垦工会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旅游协会	海南省农垦公安局
海南农垦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酒店协会	海南神泉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农垦中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旅行社协会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总公司
海南农垦中源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
海南农垦中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洋浦分行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海昌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商贸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海口市海秀大道15号      电话: 36669988      传真: 66711816